

读懂中国·年度读本系列

# 经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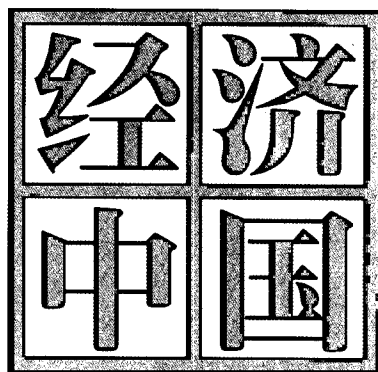
2007

韦森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读 懂 中 国 。 年 度 读 本 系 列

F12-53/47  
:2007  
2008



韦 森 主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7 经济中国/韦森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218-05729-3

I. 2… II. 韦… III. 经济—概况—中国—2007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403 号

策划统筹	钟永宁
责任编辑	卢雪华
封面设计	张力平 陈小丹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18-05729-3
定 价	37.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韦 森

# 盘点 2007 年中国十大 热点经济社会问题

——《2007 经济中国》代前言

在不断向前延伸着的当代中国经济历史上，2007 年应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一年。之所以如此说，并不完全是因为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已经走过了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国连续十多年继续高速增长的另一一年，而是因为在 2007 年发生的一些经济与社会事件也许值得记下来。由于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当下，且我们正身临其中，一些国人并没有察觉，甚至即使知道了，也许不觉得惊奇。然而，或许在几十年之后，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当人们回首反思 21 世纪初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时，也许会有人觉得，2007 年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值得一提；一些经济学人针对 2007 年中国经济社会运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所做的评论和发表的意见，有其久远的理论意义。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广东人民出版社策划了这套丛书中的《2007 经济中国》；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笔者选编了这本书中的这些文章。

1

## 一、从整体上解读中国经济

2007 年，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国人关注和值得记

下来的事情？

首先，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从而市场机制已经基本生成的当下中国社会中，就经济体制和企业运营体制来说，“改革”和“开放”这一类曾经一度是些热门的术语，目前已几乎变成了“过去进行式”，相对而言，与宏观经济运行有关的一些问题和事件，渐渐占据了当今中国网络和平面媒体中的一些醒目标题，随之也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一些热门话题。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2007年一开春，《财经》就约请吴敬琏先生主持了国内五位经济学家的访谈。在年初时，尽管五位经济学家都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表达了乐观的预期，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察觉，但似乎还没有人在上半年前就开始出现的通货膨胀有所预期。2007年上证指数上升到6000点以上，然后又大起大落、跌宕起伏，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年初所始料不及的事。相反，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较多经济学家仍然对近年来居民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表达了些许担心，担心它会拖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势头。然而，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宏观数据出来之后，房价、股价飙升，通货膨胀率抬头，资本品价格节节攀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仍然显得十分强劲。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就成了2007年全年中国经济学界和媒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国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其动力机制又是怎样的？中国这一波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还能延续多久？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学界似乎还有许多困惑。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专家帕金斯认为，可以从高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快速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对这些快速增长的资本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对外贸易的大幅度和高速度的增长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帕金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抱有较乐观的预期。他估计，中国经济至少还能在7%以上的速率再增长20年。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也一直抱着一个较乐观的预期，并提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呼唤着新的理论解释。在谈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时，陈志武教授则提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中在世界各地做生意，进行国际贸易，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机遇。陈志武还指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更能让我们今后以理性建设者、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分担世界秩序的责任，并让我们认识到改革现行中国的制度结构，并真正实现宪政法治，让世人不再对中国的崛起担忧。对于中国的经

济崛起，祁斌最近则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是并将仍然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对于中国这些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股市上半年的“疯长”以及接着而来的跌宕起伏，一些经济学人总是表示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姚洋的《从账面GDP看中国之谜》一文，就部分表达这一担忧和质疑。在《中国经济怎么了？》一文中，韦森则表示，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双繁荣”，倒不怎么令人担心。令人值得关注的事，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每年10个百分点上下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税收却以20多个百分点更高速地增长。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速率双倍甚至三倍于GDP的增长，这自然意味着政府操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在加强。在中央政府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同时，应该首先意识到政府本身在目前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政府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间各自的“增长性竞争”，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或“助推器”。这一点应该值得中国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 二、宏观调控

2007年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增长，出现了一个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现象：中国宏观经济终于结束了高增长与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并存的一种“高亢奋”的经济增长格局。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的通货膨胀（尤其是与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抬头），引起了政府宏观政策决策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从而“宏观调控”再一次便成了全年的一个“热门话题”。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危险现象，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存，通货膨胀同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竞相攀升的势头。这种势头如果失去控制，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与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密切相关。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通胀率抬头、资产价格上涨、股市疯长和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升温，媒体和经济学界一再呼吁要提高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然而，从中国2007年的整个宏观经济格局和走势而言，仍有不少经济学家怀疑中国宏观经济是否失控了，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怀疑是否政府决策层实际上对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无为的“放任自由的”方针。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宏观调控的成效会如此不尽如人意呢？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

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结构问题，并且开放度又很大的情况下，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至少是缺乏效率的。他主张，较为可取的政策组合应当是以紧缩性财政政策为主、以中性的（即保持既定利率和汇率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加以匹配的政策组合，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推行结构改革政策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效的微观基础。然而，对于宏观调控本身，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譬如，赵晓认为，就国内市场而言，无论是就消费来看，还是就投资而言，现在都不存在经济“过热”问题，因而，真正需要调控的是“外需”，而不是“内需”。基于这一判断，赵晓同意余永定的“紧货币、宽财政”的宏观政策建议。这也与华民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于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韦森也表达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物价一直没多大上涨，甚至有两年出现过“通货紧缩”现象。这说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一种“异常亢奋状态”。在前几年连续多年国内消费疲软的格局中，且在中国社会内部各方面的“钱”都那么多和那么充裕的情况下，今年国内消费开始有些启动了，消费品物价有所抬头。从宏观经济整体上来看，这是自然和必然的。这些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运作，反倒让人时时感觉有点不安，总怕这列在一条“高速轨道”上呼啸前进的“列车”会出轨。最近通胀率抬头了，反而觉得它有点趋于正常了，因为，这对中国经济整体而言，可能有一种“泄洪”效应。“国内消费需求”这架发动机启动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才有后劲。但是，内需启动的一个伴随的自然结果却是通胀率抬头。韦森还认为，从整体上来看，目前的通货膨胀可能还只是个短期宏观现象，且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一般还能承受得了。不然，这一问题会更加突出和棘手。从长期来说，我们目前应该关注的，恰恰是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根本问题，而中国的财富创造机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本身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个经济体制问题，而与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安排有关。在目前，政府要关注并应当采取措施的，是如何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而不是盲目地运用一些货币政策——尤其是靠紧缩信贷——遏制经济增长的势头。

###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

既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同意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流动性过剩问题，而这

种强大的流动性过剩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价格上涨、股市飙升、房地产价格继续攀高的最终原因，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流动性过剩”的产生原因，就成了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话题。沿着对这个问题回答的考究，人们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的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用通俗的话来说，一方面，中国出口仍然大幅度地超过进口，导致贸易顺差在2007年前三季度仍然高达185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8亿美元；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到人民币将会升值，加上上半年中国股市的飙升，大量国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这就为中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蕴生了强大的海外波涛。譬如，最近据周其仁讲，在今年2月份《中国经济观察》的报告中，易纲就提出，中国宏观经济中流动性过剩问题，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双顺差的情况下，近几年央行不是在有意“发行”货币，根本就是连“收流动性”都“收”不了！其中的道理是：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都换出去一定数量的人民币。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的货币基础。既然目前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与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密切相关，那么，人民币汇率问题，也在全年中一直成为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升值以及升值的速率应该多快这类问题上，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近些年来一再坚持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他认为，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利于农民收入，不利于农转工，不利于中国技术和科技低下的微利和接单生产的中国外贸企业的生存。樊纲也同样认为人民币不能大幅度升值。与张五常的判断相同，樊纲最近提出，如果人民币年升值超5%，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灾难，那将会导致百万民工失业。与张五常和樊纲的意见相反，余永定则认为，目前人民币升值“正当其时”。他还认为，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带来阵痛，但升值是符合中国自身的长远利益的。余永定给出的理由是，在我们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的同时，我们的贸易已经实现了持续的、大规模的“双顺差”。结果，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资本净流出的现象，这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余永定认为，继续维持双顺差已不合乎中国自身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应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与余永定的观点相类似，汪涛则



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目前互相紧密相关的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问题，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是一个有效措施。

#### 四、股市飙升与跌宕

2006年6月开始，中国股市出现了一轮长达年余的大牛市。尤其是自2007年年初以来，上证指数从2700多点节节攀升，一度突破6000点的大关。截止2007年11月22日，沪深两市账户已新增5600万，达到13500万户，与2006年相比，几乎增加72%。然而，进入2007年11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调整性的下跌，曾一度跌破了5000点的关口。2007年中国股市的节节攀升，吸引许多人进入股市，股市的跌宕起伏，这使股市一下子成了2007年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在平面和网络媒体中，中国股市向何处去，中国股市怎么了，以及中国股市是否理性繁荣这类标题，成了全年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数年的萎靡不振之后，在2006年至2007年上半年的超常增长，引起国内学界尤其是金融界的一些不同看法。几乎从2007年一开始，谢国忠等悲观派的经济学家就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虚假繁荣”的风险，并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已经太高了。甚至像格林斯潘这样的老先生，自2007年5月以来，也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和直言不讳的口吻连续三次唱空中国股市。格林斯潘老先生担心中国股市有一天会出现“戏剧性收缩”。他认为，“中国股市的上涨势头不可能持续下去，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格林斯潘的言论，曾对中国股市的政策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5·30”中国政府出手干预股市，可能就与格林斯潘言论有直接关系。然而，中国股市在2007年6月经历了重大调整之后，一路走强，上证指数一直攀升到10月16日的6124.04的高位。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对股市谨言慎行的格林斯潘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继续唱空中国股市。10月1日，格林斯潘在英国伦敦对中国股市做出了极为负面的评价：“中国繁荣的股票市场从各方面看都已经具有泡沫的特征，如果你要寻找泡沫的定义，那么这就是了。”10月30日，格林斯潘在波士顿召开的一个保险业高层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中国股市处于“非理性的繁荣”，是个迟早都要破灭的“投机性泡沫”。

与格林斯潘和谢国忠等国内业界的悲观认识相反，一些对中国股市持乐观态度的人士，则对2006年以来的中国大牛市欢欣雀跃，认为当下中国

股市的繁荣是一种必然趋势。譬如，韩志国等业界人士就认为，由于世界经济正经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美元的持续贬值与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并且升值的预期还在不断升温，导致了大量国际热钱流入中国。从国内环境来说，中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负利率，使得储蓄收益成为负数。在这种情况下，资产投资与资产价格的上涨，就成为各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由于人民币升值正处于一个“中继过程”之中，由于股权分置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潜力还处于持续发掘的过程中，加上中国经济还处于加速的进程中，因而，中国股市的牛市进程就必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无论是格林斯潘，还是巴菲特，都无法改变这种趋势。

与上述乐观派和悲观派的言论有所不同，一些专业人士则对中国股市现状做了一些理性分析。譬如，华生和金岩石等就对目前中国的股市繁荣屡屡提出了他们自己较理性的评论和判断。据华生计算，当沪深股市市值超过 22 万亿元人民币即超过 GDP 时，实际上中国公司的市值即便在 H 股、红筹股回归之前，已经是 GDP 的 150% 左右了。这不用说与中低收入国家相比，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实际上的世界之最。由此，华生认为，在中国股市微观层次上的市盈率、市净率高居世界首位，而宏观层面上股市总市值与 GDP 之比也达到惊人的高位，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基于这些判断，华生呼吁要警惕中国股市的“虚胖”。很显然，华生的这些观点，与对中国股市现状的悲观派看法有些相近，但他又对 2007 年上半年以来股市的飙升三缄其口，不说三道四。

对于 2006 年至 2007 年中国股市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跌宕起伏，处在中国宏观政策决策层以及一些围在政府政策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则相应比较理智。譬如，夏斌就认为中国股市处在一个“结构性繁荣”时期，但是他也一再呼吁股民要警惕中国股市结构性繁荣下的风险。另外，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改革后中国人“钱”多了，但是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陈志武还具体举例到，美国股市、债市以及住房按揭贷款的市值分别为 GDP 的 1.56 倍、2.1 倍和 0.9 倍，而中国相应的比值为 0.8 倍、0.01 倍和 0.11 倍，所以，中国资本化的空间还很大，还可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许多年的金融资本。在此情况下，中国股市的繁荣，应该是一个自然和必然的过程。另外，这些年来，陈志武一再呼吁，假如不放开中国的新闻媒体，如果没有公正的大众媒体充分并准确地传播上市公司以及股市的信息，“噪音和虚假信息”就会充斥市场，股市就会成赌场，股价泡沫会是经常的事。

如何看待2007年以来中国股市的繁荣和跌宕起伏，实际上也内涵着经济学家们与政府如何在如何“管理”股市上的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对中国股市一直存在某种担忧的人士总是期求政府有所作为，采用一定的措施挤压“股市泡沫”。另一方面，一些乐观人士也同样期盼政府在中国股市的繁荣发展中不断有所作为：在一方面批评政府人为“挤压”股市泡沫的“打压”政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总是期盼着政府在中国股市大跌时能做些什么，以确保中国股市无跌宕起伏的繁荣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多经济学家则认为，像任何市场一样，中国股市应该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因此，政府只能通过其有关职能机构加强对股市的监管，而不能人为地干预股市，既不能任意地“打压”股市，也不应该有意地人为“托市”。进一步的问题是，政府如何监管股市？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教授则认为，政府监管部门应通过建立各种规则监管股市，并自己率先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这样做，就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同时，如果政府有关机构通过投资者教育来引导投资者遵守规则，整个金融市场就会逐渐变得有序。一个有序的市场是不怕股价波动的。反之，如果监管部门常常受一些学者意见或者多数投资者的意愿和意见所左右，并试图对市场采取相机管理的积极干预策略，那么，结果很可能是“羊肉没吃到，反惹了一身骚”。

## 五、房地产风云

如果说2007年最值得人们关注并可能留在国人记忆中最深的事情是中国股市的飙升和跌宕的话，那么，2007年全国各城市房地产价格也是一个紧随其后的热门话题。之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这些年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巨大产业，以至于在2006年中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已经占到了GDP的10%，而是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涨跌，已经牵涉到千家万户中国城市居民的直接利益。根据易宪容的一项研究，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全国房价上涨分别只是9.7%、7.6%、5.6%，进入2007年，国内城市的房价上涨则一浪高过一浪，一、二、三线城市房价齐声上涨。于是，如何控制飞速上涨的房价，则成了2007年举国上下此起彼伏的一个热门话题。

到底如何才能控制房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一个城市房价快速上涨时，该城市的政府应当迅速增加土地供给。这当然要看当地政府是否真

正想要控制房价，或者说政府要房价降温的决心有多大。如果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满足其资金需求，其降低房价的措施就很难有诚意。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地方政府稳定房价的政策可能永远只会停留在口头上。也有不少人主张，降低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开征1%~2%的房产税（property tax）。2007年11月，深圳政府开征了城市土地使用税。果不其然，据说深圳的房价最近确实下降了许多。面对近年暴涨的房价，各城市也在推行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但是徐滇庆的研究发现，近年来，政府的限价房政策和推出的经济适用房措施，都举步维艰，完全没有按照政策设计者的意愿发展，且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好评。民众还抱怨限价房质量低，位置差，价钱并不便宜，老百姓仍然买不起。况且，即使这个城市建造了一些经济适用房，仍然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且在经济适用房的分配环节上，还屡屡出事。由此徐滇庆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实在是乱象丛生：为了抑制房价暴涨，政府今天出台一项措施，明天再推出一个政策，但房价就是控制不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民间学者秋风认为，谈到房价上涨，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房地产商，先是说房地产开发商哄抬价格，现在又说开发商囤积土地。媒体报道说，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囤积土地，更有一些开发商在得到土地后故意延迟开发。据说，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这样失灵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囤积土地？秋风认为，在近些年中国经济格局中，土地价格上涨带给开发商的收益远远大于开发房屋再出售所获得的收益，这个时候，开发商当然倾向于不去建造房屋，而是囤积土地。根据这样的逻辑，假如房屋价格上涨速度很快，则开发商会倾向于拖延开发进度，或者拖延房屋销售进度，这样就可以坐享土地价格上涨的收益。在目前政府垄断开发用地供应的制度下，所有人都会形成土地供应日益短缺的预期，因而也相信房屋价格必将无穷尽地上涨，地价当然也会持续上涨。这样一来，时间本身就给开发商带来了丰厚利润。于是，最聪明当然也是最有权势的开发商，干脆连开发的事情都不去干，而是囤积土地，静等其升值。同样沿着这条思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李华芳研究员指出，一些开发商迟交楼盘和捂盘惜售等因素，会造成房子的供应量减少，从而抬高房价。他也认为，在供给上，政府作为唯一的土地供应者，造成土地一级市场是事实上的垄断市场，因为，被征地的农户无法参与讨价还价的过程。这种土地制度的结果是，在农民收入减少的同时，却无法负担日益高涨的房价。出现这种局面，除了落实农地产权之外，恐怕别无他法。

## 六、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2007年，引起全社会较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正如中国社科院的刘小玄教授所言，近些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的话题被炒得纷纷扬扬，不少人指责市场化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纷纷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拿出有效办法来解决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较有洞见的学者则发现，造成目前中国社会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之一，不是在于政府在社会收入分配上做得太少了，恰恰相反，是在于政府控制了过多社会资源，同时通过各种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去交换或获取民间的个人资源，从而能够在一般性的政府税收之外，再次或多次从这些资源交易中获取民间的转移收入。沿着这一思路，刘小玄认为，解决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要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的所有权分散化，以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由此刘小玄认为，政府不能把什么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而是要通过“轻徭薄赋”的利民公共政策，逐步把社会资源占有权放开，还权于民，形成以民间的庞大中产阶级占有主要社会财富资源的格局。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和谐稳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也应当成为政府采取的长期发展政策。

针对中国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中的种种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的研究发现，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已从一个相当平等的社会变成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在131个有数据可查的国家中，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排在第90位，只有41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比中国更不平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他的研究也发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不算高，只有约75%的民众希望政府拿出行动来降低收入差距，但这高于一般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美国的这个比例不到中国的一半。既然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相对较低，政府在处理不平等问题时应该采取一种如履薄冰、时不我待的态度，而不是继续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

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已成了举世公认的事实，原因在哪里？2007年，在中国学界所进行的一项极其富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就是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王小鲁的调

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社会内部的灰色收入，高达四五万亿元。这天文数字般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五个渠道：行政审批、金融腐败、公共资金流失、土地收益流失、垄断行业收入。灰色收入，无疑是造成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且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通过一些灰色收入，造就了一批当今中国社会中的富人。据此韦森认为，目前在中国社会中真正富的人，私人企业家可能只是其中的少数。真正的富人，可能是那些手中直接掌握着权力或这样那样直接、间接与权力有关的人（这些人中当然也有些变成“企业家”或大公司的“老总”）。这也恰恰是人们对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因此，当今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存在收入上的“不均”，应该是常态，但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导致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或者说是发财致富的机会不均等，参与市场活动的权利上有差异。人们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差异原因上的“不公”，才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迅速富起来的主要原因。之所以如此，显然又与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要真正解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且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启动并渐进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民主与法治政制建设，从而真正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要达至这一目标，首先当做的事，还是要进一步减小政府行政干预与操控经济的范围和权力，以期用真正能进行违宪诉讼的宪法和相应的行政法，来规约政府公务员任意干预市场过程的自由裁量权，并进而加强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制衡。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堵塞权力寻租的渠道，从根子上切断那些与权力有关的人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来源。同样根据这一思路，张曙光教授则认为，反腐败是改变我国分配模式的关键。从社会政治权力的公平、经济机会的公平和经济结果的公平三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张曙光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确实有经济结果的不公平，但社会矛盾的焦点更多的是集中在前两种尤其是经济机会的不公平上。张曙光认为，过多的行业垄断，过多的行政审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决策的不透明，蔓延到司法、执法、行政领域里的腐败行为，法制不健全和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的千千万万的寻租机会，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经济机会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根据有学者估计每年因贪污腐败造成的占 10% 左右 GDP 总量的经济损失这一判断，张曙光认为，从反腐败的角度来解决社会公平的问题，并不会损害效率，反而会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 七、医疗体制改革

2007年，在媒体中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是医疗体制改革。由于这个问题将牵涉到千家万户和数万医疗卫生单位以及制药业的利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引起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2006年9月，国家医改协调小组成立。这个医改小组，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由卫生部、财政部等11个部委所组成，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发改委主任马凯和卫生部部长高强任组长。为了稳妥启动卫生体制改革，国家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和其他研究单位分别提出了九套医改方案。在2007年一年中，尽管这个医改协调小组一再放风说，新的国家医改方案将在年内推出，但到此稿发表时，仍然没有见到任何影子。这说明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十分复杂，且各方的意见分歧仍然甚大，加上各方利益仍在纠缠“博弈”，导致了在中国医改方向上目前仍旧是“烟雾重重”的态势。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说，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曾透露：“从今年5月30日八套医改方案在钓鱼台国宾馆秘密‘过堂’以来的几个月中，各方的激辩简直就像一锅粥。”

在九套医改方案中，据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所主持的方案较为中央医改协调小组的官员们所重视。李玲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近30多年的“经济奇迹”，但是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带来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譬如，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仅增加了3.8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增长。虽然卫生总费用、人均卫生总费用增长很快，可医疗卫生领域仍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部门之一。2005年8月9—11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央视资讯进行了对医疗体制改革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0%的民众对中国10年来医疗体制的变化感到不满意。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88位。在这样的态势下，医疗体制改革，看来是个无法回避的必然趋势。但是，如何改？向哪个方向改？各家研究方案均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从总体上来说，在医改方面，存在两条思路：一种思路是市场主导型，另一种思路是政府主导型。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美国是全球最市场导向的医疗卫生体制，医疗卫生的供给和需求大部分由市场来决定。在美国的医疗体制中，除严格的监管外，政府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买单和提供公共卫

生服务。市场主导型医疗体制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政府主导模式的医疗体制的典型是英国和加拿大。在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医疗服务体系，公立医院由政府全额投入，老百姓看病是免费的。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去。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普及面广。根据这两种划分，李玲主持的研究团队主张未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应采用政府主导型；相反，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则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并在媒体上连续发表文章推介“江苏宿迁医改模式”。所谓“江苏宿迁医改模式”，据悉是以卖公立医院为契机，把办医者和管医者分开，把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服务分开，把医疗服务机构与卫生防保机构分设。这也就是著名的宿迁医改的“三分”准则：“管办分离，医卫分策，医防分设”。据周其仁讲，在实行“放出来的医疗服务市场”而同时政府只坚守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医改之后，宿迁地区政府增加了用于医疗保障的开支，特别是完成了 90% 农村的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并适当提高城镇职工医保的水平和覆盖范围。对于这种模式，周其仁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因而坚持他的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医改方向。

除李玲和周其仁两人所提出的两套完全不同的医改方向外，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顾昕则认为，在未来的医改中，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而自身非成为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办者。考虑到“以药养医”是促成医疗价格虚高的“幕后推手”这一现象，顾昕认为，采取“全民医保”，就可以终结这种不良格局。根据顾昕的划分，目前的“新医改”方案大体有三条思路：一是采取行政措施控制医药价格；二是改革医疗机构，强化其社会公益性；三是推行“全民医保”。顾昕认为，第一种治标不治本，第二种容易退回计划经济老路，只有第三种才是“新医改”的出路。按照顾昕提出的医改思路，“民众参加医保后，大多数看病的钱都汇集到医保管理者那里，医保管理者就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同医疗服务提供者讨价还价，用市场手段降低医疗费用”。顾昕还提出，在这种全民医保的医疗体制中，“病人先垫钱治疗，事后到医保报销，这无法解决困难群众看不起病的问题，他垫不起那个钱”；“病人到医院看病，只需付自付费的那部分，医保报销部分则直接由医保向医院预付、划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之急”。顾昕具体建议道，要进一步提高医保报销比例，使群众自付费部分降到 20% 左右。据悉，在提供新医改方案的 9 个机构中，有 7 家对全民医保方式表示赞同。由此顾昕认为，全民医保形成后，向医疗卫生



机构支付医疗费用就由老百姓转变成了医保机构，这种付费方式的转变，可促使医疗机构重视药品性价比，同时医疗机构就可以自主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而达到医疗服务真正的市场化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医疗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弊端，是药价太高和医院以药养医的问题。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药价这样高？为什么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市场上失灵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员朱恒鹏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正是在目前被扭曲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价格越高的药，越好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怪现象？被扭曲的中国卫生体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朱恒鹏的研究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格局中医疗行业的两个显著特征：需求缺乏弹性和信息不对称。一旦遇到垄断性的市场结构，这两个特征就会导致“价格扭曲”。朱恒鹏认为，我国政府对医疗行业的管制，就恰恰造成了医院垄断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出台的药品分类管理明确规定“处方药只能由医院卖”。在我国，公立医院控制近50%的医疗市场。在此格局中，一方面，处方药只有医院能卖；另一方面，不管公费医疗，还是医保，都必须到医院去。这结果就导致现在医院卖80%的药，并且有些药只能去医院买，想报销也只能去医院。医院由此便获得了垄断权。朱恒鹏还认为，就药品而言，现在医院是“双端垄断者”：一方面垄断买方，另一方面垄断卖方。有了这样的垄断地位，医院就可以对药厂说“处方药你必须卖给我”，同时它又可对患者说“处方药你必须从我这里买”。当然，医院也有它本身的道理。从道理上说，医院本身既能抬高药价，也能抬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是，我们国家实际情形却是，医疗服务价格被政府管制人为压得很低，那医院不靠药价，又如何存活下去？结果，医院只能靠多开药和开高价药来赚取利润。沿着这条思路，朱恒鹏发现了目前医疗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想医生收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提高，医药价格下降，卫生局长、药房的医务人员之外所有行政人员的收入都要降下来。药检局、发改委的权力也要降低。朱恒鹏认为，现在医疗改革的实际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可行的办法，而在于这些办法都不能被通过。

## 八、环境污染与治理

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随着经